

近代汉口牛皮输出研究

马 伟

(佳木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汉口是近代中国牛皮输出的首要市场。其牛皮主要来源于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甘肃及贵州。从输出份额看,1876—1895年,该口岸牛皮输出占据绝对优势。1896—1905年占近七成。1906—1931年输出份额虽降至五成,但绝对数值依然较大。其中,1913—1919年在欧美大国军需拉动下,年输出量22.2万担,价值834万海关两,一度被纳入汉口“八大行”。1932年后陷入衰退,原因除国内外大环境外,还与自然灾害、汇票结算及海关统计方法变化有关。

【关键词】汉口;牛皮;输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096-12

On Cowhides Exportion in Modern Hankow

MA Wei

(School of Marxism,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154007)

Abstract: Hankow, a major commercial port in Central China, is the leading outputted center of cowhides in modern times.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cowhides are Henan, Hubei, Hunan, Jiangxi, Anhui, Sichuan, Shaanxi, Gansu and Guizhou. According to the output shares, from 1876 to 1895, The output of Hankow cowhides was absolutely dominant. From 1896 to 1905, it accounted for nearly 70%. Although the output shares decreased to 50% from 1906 to 1931, the absolute value was larger, among from 1913 to 1919, driven by the military demands of Western Powers, the annual outputs was 222 thousand Piculs(担), and price was 8340 thousand custom Taels(海关两), which was once included in "eight big trades" of Hankow. After 1932, it fell into recession. The reason is not only by the impact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ut also related to natural disasters, bill settlement and changes in customs statistical methods.

Key words: Hankow; cowhides; output

清中期,汉口已是“商贾辐辏,货物纷华”之商贸重镇。平汉铁路通车后,与平津、河北、河南等区域的货物流通更趋便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业传承,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内陆商埠。1867年(同治6年),汉口牛皮即输往海外,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牛皮贸易的开端。本文以汉口为中心,将近代牛皮输出分为三个时期,1867—1895年为萌芽期,该时期汉口的输出量独霸中国。1896—1931年为发展繁荣期,以1905年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96—1905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汉口占全国输出量

【收稿日期】2021-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代日本官厅会社在华畜产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868—1945)”(19BZS075);佳木斯大学博士专项科研基金“满铁会社‘满蒙畜产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906—1945)”(JMSUBZ2019-16);佳木斯大学教科研团队专项(JDXKTD-2019009)

【作者简介】马伟(1976—),男,理学博士,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

近七成。1906—1931年为第二阶段,牛皮年输出达千万量级,是第一阶段两倍多。同时,因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商埠涉足输出业,汉口比重回落至五成。1932—1938年是衰落期,汉口已为上海所超越。1939年牛皮虽对欧美还少量输出,但基本自上海转口。

学界对汉口牛皮贸易的调查研究,1920年代已起步,但之后却长时期陷于停滞^①。本文采用量化史学的方法,使用海关统计资料、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及东亚同文会等相关报告,着重探讨汉口牛皮的来源及分布,以图表的形式分析历年输出数量的变化及特征,并藉此解释1930年代牛皮输出业衰退的原因。

一、汉口牛皮的来源

不言而喻,牛皮产量与耕牛的屠宰量成正比。然而,历史上我国为农耕社会,“牛为稼穡之本”,历代王朝均重视耕牛,“劝农爱牛”,甚至出台律令“禁宰耕牛”、禁食牛肉。但两千多年来仍有牛肉市场,所屠宰也并非老牛、残牛,病牛倒毙,或借故误伤而屠杀,趋利冒法者皆是,宫廷、王公贵族食用多半不禁止^②。近代中国仍属农业社会,饮食惯习和法令同样不鼓励屠宰,那么,屠宰耕牛的动因为何?

第一,近代以来,西方食用牛肉(主要以黄牛肉为主)的习俗在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广州、哈尔滨等城市渐趋流行,牛肉消费的禁忌逐渐被打破,需求拉动“役牛肉用”。需特别提及的是,1906年德国投资兴建了青岛屠宰场,占地面积2.84万平方米,有屠牛室、病畜解剖室、生体检查所、内脏整理所、废肉烧却所、病畜隔离所、施毛虫检查室、冷藏送风室、冷藏库、悬肉室等18栋建筑,日最高屠牛850头^③。该屠宰场设备齐全、屠宰流程合理,是近代中国规模化屠牛的开端。更重要的是,直接策动了生牛的外输,仅青岛一市年输出量可达10万头,这也是该市成为牛皮四大集散市场的一大因素。

第二,与回族等信奉伊斯兰教者密切相关。回民因不食猪肉,故在肉食上多消费牛肉;又,因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西、陕西等分散杂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述省域的生牛屠宰^④。至于屠宰数量,因缺乏文献支撑,较难厘清,但数量一定不低。

第三,牛皮是西方大国争霸战的重要军需品。近代世界弱肉强食,战争频仍,使得牛皮和其他战略资源一样,需求大增,而其国内又供应不足,这直接推高了我国牛皮等畜产资源的输出,即军事需求拉动了牛皮的输出(下文将详述)。

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山东等养牛大省,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成为本时期牛皮生产与输出大省。从种类上看,我国牛皮分为黄牛皮和水牛皮。黄牛皮的厚度、韧性及宽幅,均优于水牛皮,加之黄牛的分布区域大于水牛,故黄牛数量要多于水牛,自然黄牛皮的产量也较高。1912—1929年,汉口共输出牛皮321.6万担,其中水牛皮数量43.2万担,占比仅13.4%^⑤。换言之,无论南方省份,还是北方省

① 黄既明《汉口之牛皮贸易》(具体信息下文注释已有体现,故不赘述)和《汉口牛皮贸易状况》,对汉口牛皮的来源、价格及中间商、输出商等状况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梳理。1930年代,汉口牛皮输出业趋于衰落。该市商会调查部所作《武汉之工商业(皮业)》,从牛皮输出业出现的新特点及输出业者、输出商的变化,分析衰败的原因。周维瀚的两篇文章也需关注。以上属调查报告性质,史料性较强,但因短时段的特点,无法触及牛皮业的全貌及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1949年后,因关注点及史料等因素,专题性研究不见踪影,仅在考察汉口商业、洋行及买办时,有所涉及。

② 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49—50页。

③ 田原祯次郎:《胶州湾》,满洲日日新闻社1914年12月,第513—515页。

④ 《中国北部之牛皮》,《中外经济周刊》第44号,1924年1月12日,总第3页。

⑤ 濑川浅之进:《关于汉口牛皮近况报告》,1919年10月9日。JACAR:B11091373000。本文对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史料,均以JACAR表示,A表示该资料为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B表示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C表示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收藏。笔者在行文仅标示检索号。

份,一般所言“牛皮”,多指黄牛皮。

从屠宰后取皮处理的程度看,牛皮又有“毛货”和“净货”之分。毛货,是指将牛皮上的腮、耳、爪、尾保留,干燥不足,且常有泥土附于皮面。净货,是指将前述附着物尽行除去,且充分干燥。价格上毛货较净货须折合,上品常至九折,即百斤毛货作净货九十斤,中品八至九折,有时甚至七至八折^①。毛货又有长毛和浅毛之分。“长毛”为10月至3月冬季所宰,又称“冷水货”。冬季肉食需求量大,生牛屠宰量自然也高,且牛皮此间含脂量或含油量充分,品质最佳。“浅毛”是4月至9月热季所屠宰,又称“热水皮”,品质略次于长皮,价格是前者的85%~90%。

作为我国最大的牛皮集散市场,汉口牛皮主要来源于上述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贵州等产牛大省,其中,河南产牛皮占五成左右,湖北、湖南、四川占四成,陕西、甘肃、贵州约占一成。河南牛皮以黄牛皮为主,皮大油多,厚度、柔韧性上佳,虫患较小,皮质最佳,宽幅和重量具有一定优势,一般5~6张合1担(百市斤),其它则需7张。价格基本维持在1担30海关两上下,一战期间曾飙升至48~52两,上品(冬毛,或长毛)甚至高达67两。该省主要分布范围:驻马店、漯河、许州(许昌)、新乡、郑州、彰德(安阳)、信阳等,平汉铁路沿线产量占近四成,洛阳、开封及归德(商丘睢阳区)等陇海铁路沿线,约占两成,周口、汝宁(汝南县)、光州(潢川县)等淮水及颍水流域占三成,南阳地区一成^②。

四川牛皮,皮质较脆,皮面略小,水牛皮占近两成。价格上,黄牛皮上品1担27两,下品20两;水牛皮上品15两,下品仅8两;而一战期间,黄牛皮增至48~50两,上品甚至高达54~56两^③产区主要分布在顺庆、广元、广安等嘉陵江流域,比重约三成,资中、合江、叙州、成都、万县、奉节、涪陵等长江流域,约占产额一半^④,冕宁、会理、西昌、越嶲等川西南方向,及松藩、灌县(今都江堰)等岷江方向约占两成。

湖北牛皮,皮质仅次于河南,水牛皮三成左右。如不分等级,黄牛皮平均价格1担29两,水牛皮一般仅为黄牛皮五至六成。一战期间,黄牛皮增至42~45两,上品46~50两^⑤。分布状况是,老河口、襄阳等汉水上游约占两成,安陆、孝感、黄陂、沙洋等府及沔阳一带占四至五成,武汉及黄冈等约占三四成。

湖南牛皮,与四川类似,皮薄毛长,干燥度不够,水牛皮占四成左右。其价格,黄牛皮27两,水牛皮仅及其一半。一战中黄牛皮一度增至41~44两,上品可达45~49两。分布范围,常德等沅江上游地方及贵州一部分,占六成左右,长沙、岳州及衡州等湘江流域占四成。陕西牛皮,品质与湖北略同。平均1担价格25两,一战期间增至42~44两,上品47~50两。主要分布,汉中约占四成,安康和西安共占六成。

以上牛皮由山货行、皮庄、牛皮行等中间商,从产地运至集散市场,要么至汉口输出,要么再移出用于制革。毋庸置疑,我国制革业历史悠久,一般可追溯至商代,因该时期已有革工。近代较早采用西式制革法,为清光绪年间所创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厂^⑥,不久上海、成都、重庆、杭州、广州等也相继机器制革。截至1931年,我国新式制革厂124家,分布于17个省份,但投资额普遍较小,超过10万元仅11家^⑦,故加工规模极为有限。上海的机器制革业最为发达,1920年代年消耗兽皮(牛马骡羊皮)至多10万担,占全国消耗量六成,其中牛皮占六七成,约合6.5万担,其中东南亚自香港输入及朝鲜牛皮约1万担,即所能消耗的本土牛皮最多5.5担^⑧。然而,民国时期随着“欧风东渐”,“西装革履”已成潮流,我国对皮革的消费呈上升态势,但国内皮革业远无法满足需求,故只得采取“生货输出、熟货输入”的方式,一度输入金

① 黄既明:《汉口之牛皮贸易》,《银行杂志·调查》第3卷第10号,1926年3月10日,第41页。

② 清水八百一:《以汉口为中心的牛皮产出及交易状况调查报告》,1933年1月30日,JACAR:B09041303800。

③ 东亚同文会编印:《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第5卷),东京:秀英舍1922年,第794页。

④ 《四川牛皮产销状况》,《工商半月刊·调查》,第2卷第5号,1930年3月1日,第1~2页。

⑤ 东亚同文会编印:《中国省别全志·湖北省》(第9卷),东京:秀英舍1918年,第624~625页。

⑥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594页。

⑦ 《中国皮革工业》(续),《工商半月刊·调查》,第4卷第四五合刊,1932年3月,第33~42页。《中国制革业概况》,《工商半月刊·调查》,第2卷第6号,1930年3月,第2~8页。

⑧ 《上海皮革工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调查》,第1卷第4号,1929年2月,第24~25页。

额与输出几乎等同^①。输出的牛皮占产量的七成以上,且输出商均为欧美商行。

二、汉口牛皮输出数量分析

1867年,汉口向海外输出牛皮146担,金额1392海关两。须提及的是,《汉口租界志》表2-34所列牛皮的输出数量。1874年,上海开始输出牛皮,输出量为1207担^②。即1867—1873年,汉口是唯一向外输出牛皮的口岸,故该商埠的牛皮输出量即为全国输出量,《汉口租界志》表2-34所列数据毋须质疑^③。而1874—1895年将全国输出量仍等同于汉口输出量^④,则有失严谨。

第一,从资料来源看,《汉口租界志》征引的资料,多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所选译的“1867—1894年牛皮输出量值”,表下已注,有含各地货币单位和数额,即有全国数据之示意。

第二,1882年《江汉关贸易报告》载,汉口输出数量2.8万担。又,《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载,1885年汉口输出约7万担,1886年约6.2万担,翌年5.2万担,1888年又增加至7.8万担,1889年约5.9万担。上述六年所列输出量,均远低于注释表1同年度数量。诚然,1881年后汉口牛皮成交量大,此后十年成为仅次于茶叶的第二大输出品。但上海也有一定规模,该时期商人习惯将被汉口拒收的牛皮移往上海出售。综合而论,该时期汉口的输出量在全国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

1896—1905年,因限于掌握的资料,系统性的数据无从获知,尤其是1896—1900年间,但结合前后的数据走势,基本可推断,数量应在10万担上下。1901—1905年,图1所示,输出量迅速超过10万担,金额超过百万两。其推动力为何?

这是欧美大国军事需求拉动的结果。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双方对军用革具需求大增,加之我国北方饥荒,屠宰耕牛尤甚,使得牛皮输出剧增^⑤。继英法之后,完成统一的德国宣称要争夺“日光下的地盘”,由此引发欧洲利益格局的分化和重组。1879年10月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同盟。1881年6月,德意志帝国又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组成“三皇同盟”。1890—1898年德国向世界强权过渡^⑥,此期间强租我国胶州湾。德意志帝国撬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1904—1907年英法俄组成了“三国军事协约”。

① 余沛华:《中国生皮与熟革进出口贸易概况》,第17-20页。

② 《商业报告》,1878年,上海。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126页。

③ 具体数据,1867年输出146担1392海关两,1868年7担78两,1869年41担437两,1870年6担63两,1871年329担4272两,1872年3971担63275两,1873年4698担37586两。资料来源:《贸易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130页;汉口租界志编辑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④ 注释表1 1874—1894年全国牛皮输出数据及金额

年度	数量(担)	金额(两)	年度	数量(担)	金额(两)	年度	数量(担)	金额(两)
1874	5953	42743	1881	38518	473525	1888	87824	922343
1875	5156	43714	1882	34946	386148	1889	60975	701890
1876	14882	126494	1883	64017	678553	1890	60271	714951
1877	56627	453081	1884	88023	960759	1891	67521	653231
1878	41350	352559	1885	90412	941113	1892	62911	495065
1879	25514	241272	1886	86721	996247	1893	95597	752747
1880	20623	252962	1887	80914	828206	1894	119002	1089919

资料来源:《贸易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130页;汉口租界志编辑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第80页。

⑤ 《中国皮革工业》,《工商半月刊·调查》,第4卷第二三合刊,1932年2月,第28页。

⑥ [德]卡尔·博恩(K.E.Born)、马克斯·布劳巴赫(M.Braubach)、泰奥多尔·希德尔(T.Schieder):《德意志史》(第三卷),张载扬、张才尧、郭鼎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5-366、429-431页。

上述国家在矛盾激化前后,纷纷扩军备战,以期取得战略优势。该时期德国人口6500万,军队却占总人口的11%;法国4000万,军队占总人口的10%;英、奥匈、意大利等国略少,但俄国军队数量远超法德^①。庞大的军队,不仅需要枪炮、子弹等武器装备,也需要战略辅助装备,牛皮自然需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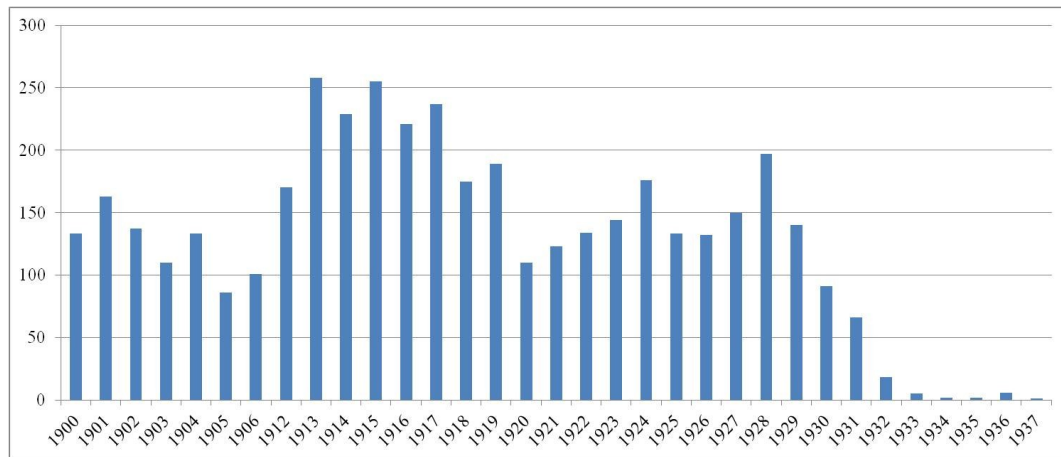


图1 1900—1937年汉口牛皮输出量(单位:千担)

截至一战前,汉口的牛皮交易几乎由德商所掌控,具体有美最时、瑞记、元亨、杜德、禅臣、和昌、礼和、咪吧、嘉利等九家商行,其次是宝顺、华昌、太平、老和顺、立兴、公兴、永兴等英法商行。之所以是德商主导,可能的原因是,德国皮革制造的传统。1873—1913年是德国经济的膨胀期^②,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工业,都获得极大发展。皮革制造业属传统工业类别,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白兰地、葡萄酒、啤酒及烟草业^③。在德商操纵下,汉口牛皮多输往德、奥匈、意大利等。1900年德人又联合法商牢牢掌控牛皮贸易,并进一步开拓了英美市场^④。在德法商行的主导下,我国牛皮的输出规模不断提升。1881—1892年,汉口牛皮输出尚在5万担上下。1900—1905年,年输出量12.3万担,规模超过了10万担。图1,1901年输出量甚至高达16.26万担,金额达265.1万两^⑤。1904年日商加入该行,输出规模又进一步扩大。

欧美国家的军需,尤其是以美英日等协约国,不仅提升了我国牛皮的输出规模,也推高了输出价格。1880年代,1担牛皮输出价格为8~10两。1890年代升至15~18两。十年间价格增长超过80%。1900年已高达32两^⑥,又增长了约1倍。1912年输出价格为38.5两^⑦。该价格在欧战爆发后,又迅速增长。1882—1912三十年间,牛皮价格增涨了4~5倍,这改变了我国传统上“因肉宰牛”的习惯,在利益驱使下,农户纷纷“因皮宰牛”。原先牛皮仅是生牛屠宰后的副产品,而今牛肉、牛皮已无主副之分。这种高屠宰率,极大地冲击着我国耕牛资源的安全性。河南是牛皮出产大省,1902年汉口输出16.3万担,其中河南产牛皮占4成,约合6.5万担。因该省牛皮略大,5~6张合1担,故该年度河南屠宰耕牛32.5万~39万头,这相当于该省耕牛资源的近两成。地方政府被迫出台政策禁止屠宰耕牛,但从牛皮输出量居高不下看,效果不佳。

① [英]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林光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② 罗斯托(W.W.Rostow)将19世纪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800—1850年是德国经济起飞准备阶段。1850—1873年,是经济起飞阶段。1873—1913年是德国经济增长浪潮阶段。参见蒂利(R.H.Tilly):《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徐强、李军、马宏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8—479页。

③ 蒂利(R.H.Tilly),《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第525页。

④ 《中国皮革业》,《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二三合刊,1932年2月,第28页。

⑤ 水野幸吉:《汉口:华中事情》,东京:秀英舍,1907年,第516页。

⑥ 东亚同文会:《清国内地调查》汉口驻在班部第二卷第一编,贸易二。JACAR:B0305053600。

⑦ 日本“扬子江通讯社”:《汉口牛皮输出额》,《扬子江报》第37号,1914年4月10日。JACAR:B03040893900。

表1 中国牛皮输出欧美日各国数量一览表(1913—1919) (单位:千担)

年度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意大利	日本	俄国	其他	总计
1913	99	93	77	64	60	23	6	76	498
1914	80	65	62	89	39	24	6	71	436
1915	92	22	—	149	73	85	6	10	437
1916	113	17	—	164	35	132	3	1	465
1917	122	15	—	237	34	57	8	4	477
1918	71	22	—	30	168	86	1	17	395
1919	81	25	—	128	28	102	11	8	383
平均	94	37	—	123	62.4	73	5.9	27	442

资料来源:日本主税局关税课:《中国贸易概观》,1925年10月。JACAR:A09050409600。

1905—1919年,即第二阶段的前半期,欧美对我国牛皮的需求持续增加,使得输出额迅速攀升。表1,1913—1919年,年输出44.2万担,较1906—1912年均29.1万担^①,增长了51.9%。这进一步表明牛皮的军事价值。在船舶等运载工具紧张,海上运输尚不安全的前提下,还年均逆势上扬五成多,足见其军事的功用。其中,1913年达49.8万担,为历年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英法美意等国的输入量较前增加了近六成;同时德国输入量7.7万担,较前也有增长,故该年度数值极为突出。

1917年3月,我国虽宣布对德绝交,但战争初期在英法俄日等劝诱下,已对德采用一些限定措施^②,故1915—1919年对德贸易陷入空白。其份额由美日瓜分。表1,美日合计平均输入19.6万担,占比44.3%,比重超过战前任何时期。1917年,美国输入了23.7万担牛皮,占比近五成,直接拉动其成为仅次于1913年第二高的年份。同时,日本自此也成为我国牛皮的重要买家。协约国方面,英国年输入牛皮9.4万担,法国3.7万担,意大利6.24万担,俄国略少,0.59万担,四国合计19.93万担,占牛皮出口总量比重的45.1%。即对协约国与美日共计出口牛皮39.53万担,占牛皮出口总量比重的89.4%。1920—1923年战后年输出降至25.3万担^③,较战争期间降低了43.8%,但还未恢复战前数值。即对欧美大国而言,在合成材料尚不成熟的前提下,牛皮是无法替代的军事战略资源。这种急速的军事需求是我国牛皮输出高峰的主要因素。

表2 汉口牛皮输出数额(1913—1929) (千担;千海关两)

年度	数量	金额	年度	数量	金额	年度	数量	金额
1913	259	9055	1919	189	6210	1925	134	4577
1914	230	8439	1920	112	3621	1926	133	4326
1915	255	10966	1921	124	3833	1927	150	4911
1916	223	9272	1922	160	4663	1928	198	10750
1917	238	9383	1923	177	5552	1929	141	7604
1918	176	6100	1924	144	4164			

资料来源:《汉口牛皮贸易状况》,《工商半月刊·调查》,第2卷第8号,1930年4月5日,第41—42页。结合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汉口港牛皮集散状况》,1925年3月19日,JACAR:B11100881800;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清水八百一:《以汉口为中心的牛皮产出及交易状况调查报告》,1933年1月30日,JACAR:B09041303800。

从输出比重看,1913—1919年汉口年均牛皮输出量为22.4万担,占全国51%。图1,迅速由战前15万量级上升至20万级。表2,1913年输出数量最高,25.9万担,金额905.5万两,这一点与表1所示的输

① 余沛华:《中国生皮与熟革进出口贸易概观》,第12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2页。

③ 日本主税局关税课:《中国贸易概观》,1925年10月。JACAR:A09050409600。

出量基本一致;1915年输出金额最高,1096.6万两,数量25.5万担。从两组数据的差异看,1915年输出量略小于1913年,但金额却高出191.1万两,主要原因是输出价格提升了两成,1916年又有所提高。其中,该年度2月份河南牛皮最高1担63两,最低61两;3月份最高64两,最低60两;4月至6月略有下降,但最高也达57两;7月份最高升至66.5两,最低64两,一直持续至8月末^①。即最高价和最低价间差距较小,有的1担仅差一二两。这足以说明,在极度需求拉动下,牛皮价格一直在高位徘徊,输出商已无暇顾及价格了。该时期牛皮业一跃成为汉口商贸界的“八大行”之一。

1920年代,即第二阶段的后半期,汉口牛皮输出量随即下降。结合图1和表2,1920—1929年平均输出量14.7万担,略低于15万担,仅1923、1928两年度略高。原因是,输出价格的持续下降。图2,1915—1916年平均价格超过40两,1917年低于该价格,1918—1927十年间价格始终游离于28~35两区间,这已低于战前的输出均价。该阶段价格持续走低,主要原因可能是供应过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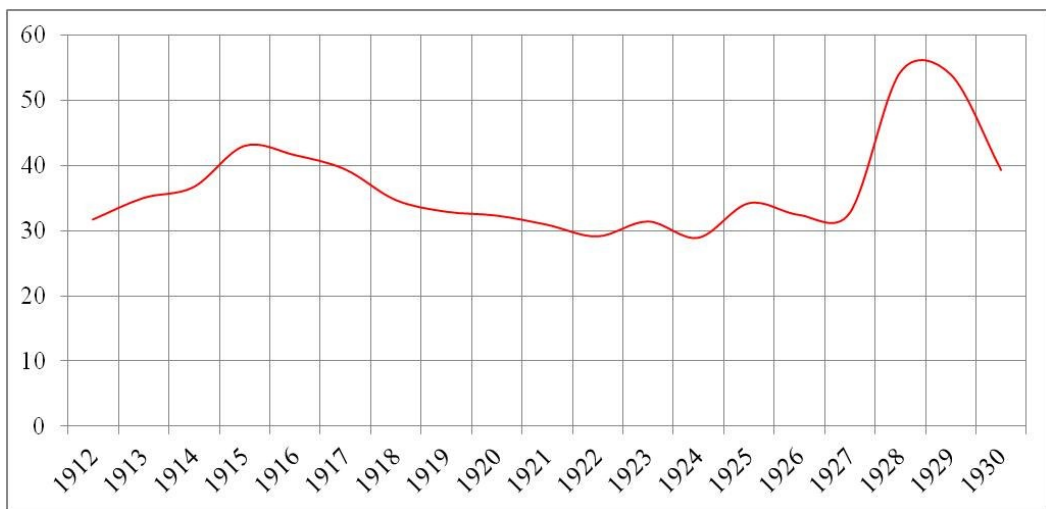


图2 1912—1930年汉口牛皮输出价格曲线图

1920年我国北方发生了“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北洋政府内务部赈务处《赈务通告》显示,黄河流域亢旱异常,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等334个县受灾,受灾率60.7%,其中71个重灾县^②。1921年皖、豫、苏、浙、直、鲁、湘、黔、鄂、秦、陇、蜀、赣等13省又发生水、旱、兵、震、风、雹、山洪等灾害,河南受灾最广,共64县^③,因灾荒波及范围广,受灾度高,“死亡枕藉、痛不忍言,幸获生存亦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为此,旅京140多名流组成“辛酉(1921)被灾各省救济联合会”,募集资金赈灾,但也是杯水车薪。简言之,1920年代前期我国北方自然灾害和战乱频发,粮食被消耗殆尽,耕牛等牲畜,或因充饥被屠,或因疫病被宰,牛皮供应过多,价格自然较低。1922年每担牛皮输出价格仅29.1两,而农民出售价势必更低。1923—1927年间牛皮价格略有震荡,但依然在低价位徘徊。

1928—1929年牛皮价格突然爆升至每担50两以上,超过欧战时期43两上限。这直接拉高了牛皮输出金额,但似乎又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该时期世界经济需求紧缩,南美、印度等牛皮供应增加。我国却缘何能逆势上扬?究其原因,第一,从国内角度看,1926—1928年我国爆发了国民革命,武汉三镇是革命的主要城市,这对商业城市汉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是军费摊派。吴佩孚向武汉商会摊派150万元,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该笔款项转交蒋介石,后又向商团借款260万。宋子文还发行公

① 东亚同文会编印:《中国省别全志·湖北省》,第626页。

② 内务部印行,《赈务通告》1920年12月25日,《公牍》第6期,第37—39页。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页。

③ 辛酉被灾各省救济联合会编印:《辛酉被灾各省救济联合会报告书》,1921年,第106—107、115—117页。

债3500万,强令商工界“应募”,最终推行800万^①。这种强行筹款摊派,致使汉口商界被迫转移资本,或降低成本,削减开支,其中码头搬运工、轮船公司等工人首当其冲,致使罢工或停工一再发生,同时,又加剧了劳资纠纷。即使商会调停,也无济于事,1929年1月12日,汉口罢工依然在继续。3月17日中央军离汉,汉口商会终于松了口气^②。这对汉口商业影响极为负面。

二是车辆、轮船等多被征用,甚至一段时间蒋介石发布命令,禁止南方船只驶离口岸。北伐战争期间,唐生智军船事务所强租民船。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征调汉冶萍轮船运输事务所全部轮船,造成交通阻滞,致使运输上的瓶颈加剧。牛皮出产大省——河南,处于军阀混战的中心,平汉铁路不通,来汉牛皮稀缺^③。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二次北伐,在四个集团军中,其中三个在该铁路沿线行动^④,还征用客货车414辆。5月,奉军退出关外时,又扣去客货车2300余辆,以致平汉路中北段车辆皆无^⑤。1929年仍兵戈不息。运输不畅是汉口牛皮价格高涨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二,从国际供应端看,南美及印度的牛皮品质弱于我国。河南牛皮厚而干燥,一般厚度超过5毫米,疵痕少而纤维致密,南美及印度则略逊^⑥。又,印度的商权完全由英国掌控,南美则因运输距离而成本高企,而近代中国是世界上极开放的经济体,税率低下,欧美各国深耕六七十年,有着成熟的收购体系及商业特权,可较易获取,但因我国内部运输不畅使得价格高昂。然而欧美日的需求并未降低。以上诸因素,造成牛皮输出价格逆势上扬。

前接图1,1920年代维持较高输出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日本输出增加。1915—1919年,我国牛皮对德输出完全终止,该空缺部分由日本予以填补,且该国需求提升极快。1920—1923年对日输出合计已达37万担,占输出量的37%,远超欧战期的20%^⑦,提升了近两成,日本俨然已成为汉口牛皮输出的第一大国。1925—1926年,汉口共外输23万担牛皮,日本9.8万担,占比高达42.6%^⑧。此后输出的比重及数量虽有震荡,但整体未降低太多。

三、1930年代汉口牛皮输出量下降解析

汉口,与上海、天津、青岛及大连等沿海港口相较,属内陆口岸,对外贸易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的规模,较直接贸易大。1920年代后期长江上游的重庆、万县、宜昌、长沙等口岸,加大了与上海,或外洋的直接贸易量,而不经汉转口,但彭雨新依然认为,整体上看,汉口间接贸易比重大的特点依旧维持^⑨。从统计上看,汉口及其他各埠的土货,凡由他口转运外洋者,在原起运口岸,均列于转

① 龙从启:《我对武汉政府经济的所见所闻》,《武汉文史资料》,1984年第1辑,武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2月印刷,第30页。

②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6卷第5期,第126页;《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期,第161页。

③ 《汉口牛皮贸易状况》,《工商半月刊·调查》,第37页。

④ 1928年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继续北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将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线间北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再转京汉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3版,第1085—1089页。

⑤ 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25—26页。

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关于中国的皮革输出》,1931年9月3日。JACAR:C14061040000。

⑦ 日本主税局关税课调查:《昭和财政史资料》第5号第183册,《中国贸易概观》,1925年10月。JACAR:A09050409600。

⑧ 清水八百一:《以汉口为中心的牛皮产出及交易状况调查报告书》,1922年1月30日。JACAR:B09041303800。

⑨ 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

口贸易统计,而不按直接贸易计算。1912—1931年汉口间接输出占70%以上^①。江海关(当时上海海关的称呼)也在统计上刻意突显该特点。据该海关统计,1932年汉口直接输出总值为3200万元,1933年则降为700万元;而转口贸易总值由1.07亿元增至1.35亿元。两者相较,转口贸易数额,可弥补出口贸易之减少^②。即使1933年的间接贸易量比重由1932年的77%增加到95%,而贸易总量却变动不大。很显然,江海关改变统计方法的目的是制造贸易额的增加^③,以此说明汉口商业依旧繁荣。美国人布兰特(Loren Brandt)、萨金特(Thomas J.Sargent)也以埠际间转口贸易的增加,说明1934年后中国已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④。事实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进出口影响深远。1931年我国土货输出14亿元,1935年仅剩5.7亿元,较前下降了60%,即使扣除东四省数值,仍系衰退,而且各商埠普遍是输入远大于输出^⑤。1935年汉口输出仅为输入的38%,即整体上衰退已是事实。在此基础上,汉口第一大牛皮输出市场的地位被上海超越。至于超越的原因,还有以下三点需说明。

第一,1930年代汉口被上海超越,与统计方法的变换相关联。表3,“输出”“输移出”属直接贸易,“移出”可称之为“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经过贸易”^⑥。近代中国五大商埠(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汉口)中,汉口的进出口贸易最为繁琐,除输入、输出两大项外,还牵涉洋货的再输出、复输入,土货的复输出及转口等。

表3 汉口牛皮输出数额(1932—1937) (单位:千担)

年度	黄牛皮			水牛皮			合计
	输出	移出	再输移出	输出	移出	再输移出	
1932	18	25	1.5	8.4	8	0.3	61.3
1933	5	52	3.7	1.3	9.5	1.7	73.2
1934	1.6	43	2.8	0.8	8.3	1.5	58
1935	0.9	27	2.8	2	5.2	2.4	40.3
1936	7.8	70	2.3	1.4	14.4	1.8	97.9
1937	1.5	62	1.6	0.6	7	2.8	75.5

资料来源:日本“兴亚院”户田佑二、福田良久,《武汉地区重要国防资源畜产物调查报告书》,《调查资料第25号》,1941年11月,第86—87页。JACAR:A06033011100。

清末及民国时期,汉口与上海、宜昌、长沙、九江、沙市、重庆等口岸存在间接贸易。从数额上看,自宜昌、九江、长沙、沙市、重庆等中西部口岸,向汉口输出远高于自汉口输入,而自上海输入则远高于输出^⑦。这说明长江中上游的土货,基本是以汉口为主要集散枢纽,输至汉口后,或转口外输,或经上海输出^⑧。1930年代中前期,无论是自汉口的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均被统计为汉口对外贸易额。而该时期经上海的间接贸易额,部分已不计入汉口。表3所列“合计”栏目的数值,实际是汉口的“集散量”,这与上海输出量不相上下。

① 涂文学 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下),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65、177—178页。

② 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印:《1933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卷一《贸易报告》,第25页。

③ 蒋清宏:《关税、币制与经济:中美比较研究(1870—1936)》,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199—200页。

④ Loren Brandt, Thomas J. Sargent: "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 S. Silver Purchases",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Vol. 23, No. 1, pp. 46—47.

⑤ 胡焕庸:《中国商业地理大纲》,《地理学报》第3期,1936年4月,第247—248页。

⑥ 武增干编:《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00页。

⑦ 《汉口贸易总论》,《湖北商务报》(第14册)。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第359页。

⑧ 张克明:《汉口历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2月,第17页。

表4 汉口牛皮移出量与上海输出量比较(1932—1937) (单位:千担)

年度	上海输出量	汉口移出总量	年度	上海输出量	汉口移出总量
1932	42	33	1935	38	32
1933	66	61	1936	90	84
1934	77	51	1937	88	69

资料来源:(1)1932年上海数据,实业部统计长办公处编《实业统计》,第1卷五六期合刊,1933年11月,第58页。(2)1934—1937年上海数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华中兵要兽医卫生志》,第十八章“关于中支那畜产加工业”,1941年2月20日,第413—415页。C13110013800。

说明:1933年系上海1—6月皮革统计数据推算而来。皮革含牛皮和马驴骡皮。依据牛皮在皮革中占比六成,上半年皮革输出量占全年七成。1933年上海上半年皮革输出7.3万担(《实业统计》第一卷第五六期),推估全年11万担,牛皮输出量则是6.6万担。

表4汉口移出总量,系表3黄牛皮和水牛皮“移出部分”相加所得。整体考察上表所列汉口移出量和上海输出量的数据,一个显著特点是上海输出量随汉口移出量变化而变化,这直观地说明上海牛皮输出量是以汉口间接贸易额为支撑的。表3,1932—1937年汉口牛皮年集散量6.8万担,较1920年代已有较大减少,但上海输出量年也仅6.7万担(表4所示),两者基本等同,即已说明问题。当然,上海牛皮资源的腹地,有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蚌埠、九江、南京、重庆等经上海也直接输出牛皮,数量较少但一直稳定。综上所述,该时期上海牛皮输出量的增加,有统计方法变换的因素。

第二,自然灾害是汉口牛皮下降的另一因素。1931年3月以来,湖北淫雨不止,江汉关水标一度达16.35米的新记录,各河堤防十之八九非漫即溃,为“百年未遇之大水灾”。汉口地势低洼,早已为巨浸,可行舟。据该年度《国闻周报》《时事月报》《申报》《民国日报》等报道,三镇被淹16.3万户,码头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失业10万人,工厂关门,商铺歇业^①,损失难以计量。此次大水后,各牛皮产出市场纷纷变更交通线路,直接运往上海外输。

第三,汇兑业务对汉口商业环境也较为不利。该时期,汉口实行现金集中申请制,商人申请汉汇兑由1010元,提升至3000~4000元,各路商家视汉票为畏途^②,这等于主动将汉口皮业推向上海,而上海金融业、汇兑业及运输业均极为发达,超越汉口是水到渠成。又,运销途中税捐繁重、东西洋商压榨、牛皮仿制品出现等诸多因素^③,都造成汉口牛皮输出业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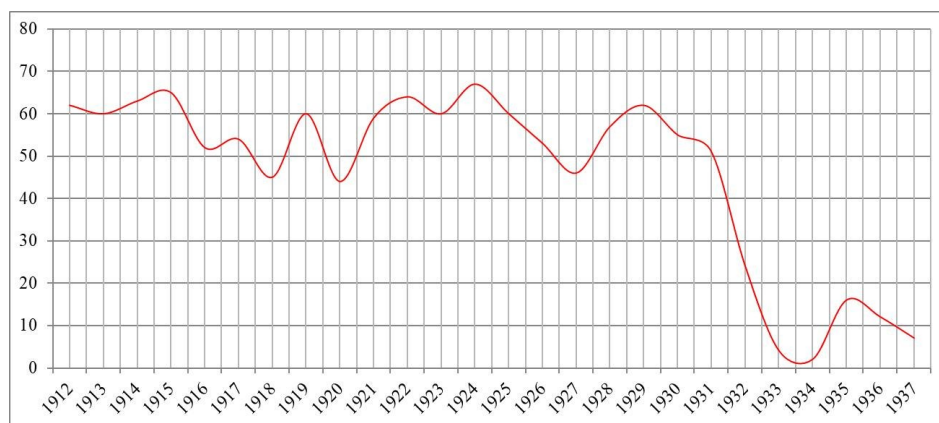


图3 1912—1937年汉口牛皮在全国输出额中占比曲线图(%)

①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6—298页。

② 周维瀚:《汉口皮业之盛衰及其经济概况》,《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7期,1935年7月,第81页;周维瀚:《本市(汉口)皮业衰落之内幕原因》,《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8期,1935年8月,第95页。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武汉之工商业》,《商埠经济调查丛书》,1932年7月,第155—157页。

图3所示,1912—1931年,汉口在全国所占比重,除个别年份低于50%,其余均在50%~70%间。再结合图4从全国角度考察其特征。图4,上曲线是全国牛皮输出量的走势轨迹,下曲线是汉口的走势轨迹,两者间的灰色部分则是汉口之外商埠的输出数量变化图。需说明的是,1913—1919年及1927—1929年灰色较厚部分,是近代牛皮输出的两次高峰期。从所占份额看,汉口并未有大的提升;而上海、天津、青岛等口岸却提升较大。这与西人“订单贸易”制密切相关。

西方商行在汉口、上海、天津、青岛等口岸市场均设有组织机构,需求激增时,上述口岸依据该制度,积极填补空缺。据汉口商会调查显示,在需求迫切时,欧美商行会向华商出相当之价格订货,订立契约并交80%的货款,交货后支付所剩款项,交货期限80日。如1担牛皮50两,订购百担共计五千两,定金则为四千两,不问期间货价之涨跌^①。然而,汉口牛皮市场经过晚清及民国前期的发展,在河南、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等省形成了成熟且稳定的中间商收购体系,即便海外需求量剧增,因本身基数已极大,且呈饱和态势,故提升的空间也就有限了。这是图4下曲线在两次需求高峰期仅小幅抬升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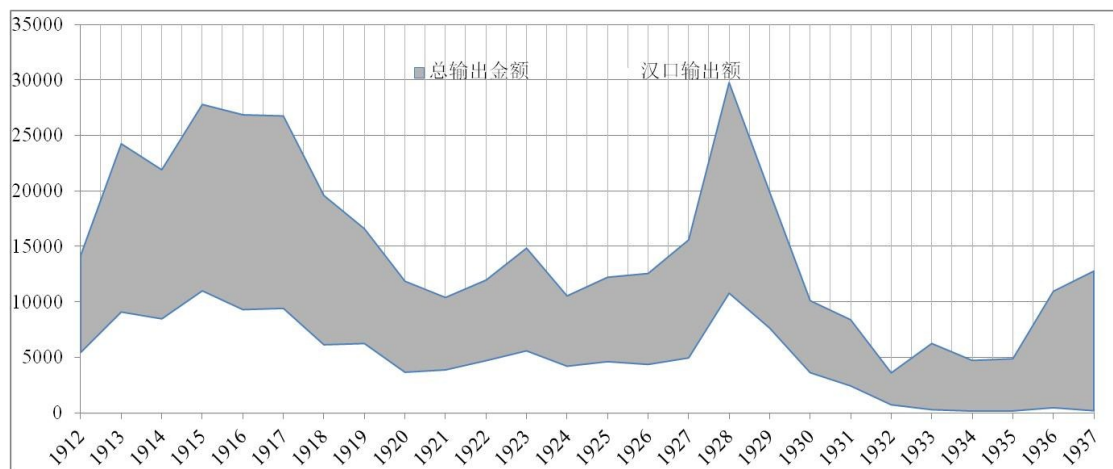


图4 1912—1937年汉口和全国牛皮输出量比较曲线图(单位:海关两)

而天津、青岛、上海等口岸市场因市场空间的弹性较强,在“订单贸易”的刺激下,提升空间自然较大。1914—1916年,天津牛皮年输出量3.8万担,金额超过130万两^②,而在此之前仅1万担上下。1918年,上海输出量4.9万担,金额166.7万两,此前也仅万余担。1912年青岛输出牛皮2.9万担,金额71.4万两;1913年数量即提高了38%,达3.9万担,金额128.3万两^③,主要输往日俄等国。1916—1919年该口岸年输出量3.98万担,金额137.7万两^④。第二个高峰期除上述因素外,价格高企是主因。总而言之,在需求高峰期,汉口不是推高总量的主要因素,真正的推手是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其他口岸城市。这是图3两部分灰色较厚的原因。

1930年代,汉口输出量急剧下降,输出对象也发生变化。此前以欧美为主,而“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对日输出不降反升。这主要源于国民政府在军政层面对日绥靖,在贸易上同样如此,致使我国战略资源流向敌国。1932年7月至1935年6月,汉口共输出牛皮18.7万担,日本14万担,占比高达74.9%;欧美合计仅4.7万担,仅占25.1%^⑤。仅从牛皮贸易角度看,日本已成独霸之势。

① 《汉口牛皮贸易状况》,《工商半月刊·调查》,第2卷第8号,1930年4月5日,第37页。

②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关于天津牛马羊皮需给状况》,1917年11月26日。JACAR:B11091370600。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研究》附录表35,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3—264页。

③ 《青岛生牛皮调查回答》,JACAR:B11091368200。

④ 侯厚吉:《我国生皮之出口贸易观》,《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3号,1933年3月,第192、194页。

⑤ 汉口市商会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三十一)——皮业》,《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10期,1935年10月10日,第51页。

1938年,汉口牛皮输出在海关统计中消失。同年10月,民国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将四大类物品纳入管制行列,牛皮属第二类^①。因禁止资敌关系,牛皮之外销陷于停滞。1939年春,西安、重庆等地纷设皮革厂,并与军政部制革厂一起,在河南等产地收购牛皮^②。牛皮外输渐转内销。

余 论

毋庸置疑,以汉口为中心的牛皮贸易,一方面推动了该市在近代的商业繁荣,另一方面也促使牛皮业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输出行业。同时,自从牛肉、牛皮等畜产品成为重要的输出产业后,国内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耕牛因此而紧缺”,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先后出台政令,“禁止屠宰耕牛”。但从牛皮的输出量看,第一,该禁止令收效甚微。第二,通过考察牛皮的输出数量,发现耕牛的屠宰还持续处于高位。第三,既然屠宰量持续高企,那么,耕牛紧缺是否可信。

第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赘述。如前所述,1912—1929年汉口共输出牛皮321.6万担,年17.9万担,如1担合7张牛皮,年需屠宰耕牛125.3万头(含病死);以河南牛皮计,1担合6张,则年屠宰107.4万头。进而言之,该时间段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陕西、贵州之一部,年屠宰107.4万~125.3万头,十八年间屠宰1930万~2251万头。从汉口牛皮输出的比重看,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占八成以上,年屠宰86万~100万头,因近代我国牲畜统计数据缺失较严重,故以南京农业大学李群教授的耕牛校正数据为依据,1920年河南、湖南和湖北三省水牛和黄牛数量,合计647万头^③,得出屠宰率13.3%~15.5%,而且还有部分牛皮是通过上海、天津、大连及青岛输往海外,故该屠宰率可能还会更高。

在不计自然灾害及战争的状况下,农区的牛生产率不会超过15%。而上述屠宰率与生产率相较则为-0.5%~1.7%,即增殖率可能临界于负值,而且1920年代自然灾害、战争还频频发生,但十八年间耕牛的屠宰量持续高企,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并不存在耕牛紧缺问题。毫无疑问,该判断是错误的。简而言之,“耕牛肉用”“因皮取肉”,造成地屠宰高企,本身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作法,不具有可持续性。但近代以来损益率却长期维持在15%上下,这或许是民间耕牛储量大,而统计或估计不足。1931年民国政府曾就全国耕牛与田亩的关系进行考察,结论是1头牛平均须负担54亩田地,湖南、湖北略好,河南却高达168亩^④。1头耕牛负担54亩田地,还有拽车、犁地、耙地及运输,本身已超负荷了,而河南却高出3倍有余,足见该省耕牛缺乏之严重。而且有些地区人力耕作已较为普遍,故近代耕牛紧缺是切实的存在,并非伪命题。

[本文初稿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2020年10月16—19日)学术会议作了初步交流。在此,对与会学者及两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重要修改建议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①《战时经济法规》,《经济动员》第11期,1938年11月15日,第527页。

② 河南农工银行经济调查室编印:《河南之牛羊皮》,1943年1月,第15—16页。

③ 李群:《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92、95、98—99页。

④ 刘行驥:《中国耕牛问题》,《中国实业杂志》,第1卷第12期,1935年12月15日,第2182页。